

鄞县胡家故

穿越封锁线



原来，那些天，他只带着一个工友，日夜兼程，步行到千余里外的省教育厅领取经费。这一介书生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数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。

1942年，春天来了。

随时出现的敌机，使全校师生草木皆兵。学校经常漏夜集合，每个学生都必须带好书本、文具和铺盖，每人还要带足半个月的粮食，负重行军。

那一年，胡祖源读高三，作为学长他们还要背一枝步枪和100多发子弹。

每天睡觉时，灯笼就放在床头，早上起来时将铺盖行李捆好，一有惊讯，立即往深山人迹罕至处疏散。一次又一次，考验着这些年轻人敏感的神经。

最狼狈的一次发生在5月，不久前刚刚紧急集合过，结果是虚惊一场。他们总以为可以睡个安生觉了。哪知半夜警报又响起，又是5分钟内整装，拖着还没来得及打好的被子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崎岖山路上行军。

但是，这些孩子实在太困太困了。

胡祖源记得，当时很多学生在路边睡着了，沿途一路，都是丢弃的铺盖和粮食。

一向以严格著称的赵校长，这一次竟没有责罚他们。只是把他们叫醒，催他们赶紧

上路。

天还没亮，一阵轰鸣，大家在山上远远地看到，高中部所在的清风公祠，在火光中，变成了一堆废墟。

孩子们睡眼惺忪面面相觑，突然有人哭出声来，很快大家一片抽泣。谁也说不清，这场痛哭，是因为痛失校舍，还是庆幸躲过浩劫，或者是有感于流离失所的命运。

赵仲苏安排孩子们撤至附近的雅安，他做了个决定，把学校迁往数十里开外，相对安全的珍溪村。

但是，钱呢？

当时，整个浙东都在日军的包围中，交通中断，教育经费迟迟不见踪影，长久的饥饿折磨着每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男少女，而迁校，也需要一大笔经费。

学生们发现，每天查房的赵校长，突然不见了。老师们什么也不说，一如往常地上课，只有师母徐翠，常常会发呆出神。

那年6月，在一次次转移和流亡中，学校甚至没有来得及进行毕业考试，胡祖源他

们根据前5个学期的平均成绩毕了业。

清风公祠毁了，几乎所有行李都变成了灰烬。可是他们如此庆幸，因为每个人都好好的，还学有所成。

终于，在一个夏天的深夜，赵仲苏回来了，拖着十几只油墨筒、蜡纸筒，还有一大叠空白文凭。他变得又黑又瘦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衬衫，粘在背脊上，来不及擦把汗，就兴奋地把同事们叫起来，拿刀小心地裁开那些油墨筒、蜡纸筒，从夹层里取出了一张张钞票。

原来，那些天，他只带着一个工友，日夜兼程，步行到千余里外的省教育厅领取经费。这一介书生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数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。中间有那么一次，碰到日军的盘问。

他平静地说，自己就是个穷教书的，帮学校跑个腿。所幸，日军对这些教具不感兴趣，挥挥手，放行了。

那年暑假，学校顺利地迁到了珍溪，而危险却没有就此远离。



同心协力顶风冒雨搏激流

日军的驻地就在四十里开外，课堂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。

在赵仲苏的安排下，学校坚持上课，老师和学生们昼夜轮流放哨。站岗的地方，放了一棵“消息树”，一有敌人出动的消息，就推倒消息树报信，自己再飞奔回来。

撤退变成了家常便饭，初三学生楼思仁，就在一次撤退途中掉了链子。

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冬日，楼思仁和另外两个同学放哨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两人闲得无聊，这时刚好有住在附近的成年插班生过来，他们拿出一副麻将：“摸一把？”

这是校规明令禁止的事，可是，日子太紧张太单调了。到底还是孩子，被压抑了太久的心，蠢蠢欲动。

很快东窗事发，另外一个学生先听到风声，哭着来求楼思仁。他说自己家里穷，好不容易考上的公费生，如果被校长知道，取消公费生资格，就读不成书了。

那个男孩捂着脸，弯着身子，眼泪一把，楼思仁心软了，他义气地承诺：“你放心，这事我扛着。”

果然，到了赵校长问他的时候，他一口咬定，是自己和这两个插班生打麻将，另外一个是附近村民，他不认识。

“这么说，这事你都认了？”校长盯着他，那目光让人害怕。

“我认！”他壮着胆子回答，心里思量着，再严厉的惩罚，咬咬牙，也就过了。

校长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“你收拾一下，走吧，不用再读书了。”

他说得那么温和，可是对楼思仁来说，仿佛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。

开除的告示很快贴了出去，不容商量，不留余地。

那是1943年初，楼思仁那么不甘心，在他的老家东阳农村，读书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，同村10多个人去考，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。学费100块大洋，当时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每学期之前，父母就商量着卖米、卖猪，筹划了好长时间，才把钱凑

齐——再过不到一个学期，他就可以初中毕业了。

所幸，这是一个不认命的孩子，他不哭不闹地收拾了东西，眼泪汪汪地冲校长和老师鞠了个躬，然后干干脆脆地离开。只是，下山的时候，他擦干泪，下了个决心。

赵仲苏再次见到这个被自己开除的学生是差不多大半年以后，那时学校刚搬到磐安大皿，学生都要参与维修校舍，男生排成一排在那里搬砖。

楼思仁也在其中，远远地看到赵仲苏走来。

他急忙把头低下，可是，还是被一眼认了出来。

赵仲苏觉得不可思议：“楼思仁？”

被校长叫到名字的那一刻，楼思仁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在那次被开除之前，他几乎没有和校长打过照面，更没有说过话，全校近千名学生，校长怎么就把他认出来了？

见躲不过，他索性抬起头，如实相告：被开除后，他深深自责，痛改前非。拿着宁波中学的成绩单，又到金华读了半年初中，拿到了学历。然后，再一次以新生的身份，考入宁中的高一。

校长点点头，问他：“那以后不会再犯了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说，他不敢想像，如果那天打牌误了事，会有什么后果。“您开除我，是不希望有第二个人效仿。”

校长拍了拍他的背：“好，有勇气！加油！”

楼思仁的眼里，有了盈盈泪光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当初开除自己，校长肯定也很痛心，否则，怎么可能在隔了这么长时间后，还记得自己的脸？

谁能想到，命运在这里不留痕迹地安排了一个伏笔。那个贪玩的少年，从此加倍发愤图强。半个世纪后，他成为赵校长一家最感激的人。

这当然是后话，当时，楼思仁和所有学生一样，对校长只有敬畏。

除了搬砖外，当时的条件下，他们还要干很多苦力活，比如运柴火。

那是个壮观的场面，狂风怒号，暴雨肆虐，成百支松明火把在大皿湍急的溪流边闪烁，沿溪两岸上上下下几百米的范围内，近千人在奔忙呼喊。

说来，现在的人或许无法理解，近千名的师生顶着风雨和激流，甚至冒着一定的危险，只为解决在现在看来很小的一件事情——食堂的燃料。

1943年8月，为了减少敌人的威胁，赵仲苏再次克服重重困难，雇佣2800名壮丁抢运全部校产，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，跋涉160余里山路，将校产转移到崇山峻岭之中的磐安大皿村。

这是个位于东阳、永康、缙云和仙居四县交界山脉中的小山村，交通闭塞，日寇一时难以进犯，孩子们终于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学习时光。而与之相伴的，是物资的匮乏。

比如，当时食堂上千人的伙食，柴火的供应是个大难题。所幸当地的乡绅们会支援学校一些山上的树木，学校雇民工去砍伐，运输则由全校师生自己完成。

按老乡的指导，他们把砍伐下来的树木截成二尺来长的一段段，再一堆堆地码放在山坡下的河边，等雨季河水暴涨时，便组织一部分同学，用长竹竿在拐弯处拨动、疏通，以保证运输畅通。

在大皿镇内，学校则组织全部在校师生，在羊家祠堂前及石拱桥两处打捞。

那是一个艰巨的工程：先由一批身强力壮的同学站在水中用铁耙子等工具打捞，在他们的腰间都系上一根长长的铺盖绳，由岸上的好多个同学拉着，以保证安全。

等打捞到的木柴一个个传上岸来，再由年级低的同学或女同学抬的抬，扛的扛，一块一块运送到伙食房后面的山坡下，以备晾晒存储。

很多次是冒着大雨进行的，往往从午饭后一直捞到黑夜，同学们轮流着吃晚饭，晚饭后再点起松明火把接着打捞。

发现鬼子就推倒「消息树」



在赵仲苏的安排下，学校坚持上课，老师和学生们昼夜轮流放哨。站岗的地方，放了一棵“消息树”，一有敌人出动的消息，就推倒消息树报信，自己再飞奔回来。

这是校规明令禁止的事，可是，日子太紧张太单调了。到底还是孩子，被压抑了太久的心，蠢蠢欲动。

很快东窗事发，另外一个学生先听到风声，哭着来求楼思仁。他说自己家里穷，好不容易考上的公费生，如果被校长知道，取消公费生资格，就读不成书了。

那个男孩捂着脸，弯着身子，眼泪一把，楼思仁心软了，他义气地承诺：“你放心，这事我扛着。”

果然，到了赵校长问他的时候，他一口咬定，是自己和这两个插班生打麻将，另外一个是附近村民，他不认识。

“这么说，这事你都认了？”校长盯着他，那目光让人害怕。

“我认！”他壮着胆子回答，心里思量着，再严厉的惩罚，咬咬牙，也就过了。

校长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“你收拾一下，走吧，不用再读书了。”

他说得那么温和，可是对楼思仁来说，仿佛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。

开除的告示很快贴了出去，不容商量，不留余地。

那是1943年初，楼思仁那么不甘心，在他的老家东阳农村，读书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，同村10多个人去考，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。学费100块大洋，当时真的不是一个